

海派 小說論

李今／著
宋如珊／主編

對海派小說進行文化解讀和闡釋，
從海派小說重構都市文化的景觀，
從都市文化透視海派小說對人生與人性的重塑。

海派小說論

李今

海派小說論／李今著.-- 一版.-- 臺北市：
秀威資訊科技, 2004[民 93]
面；公分.-- (大陸學者叢書；CG0004)
參考書目：面
ISBN 986-7614-80-1 (平裝)

1. 中國小說－歷史－現代(1900-) 2.
中國小說－評論

820.9708

93023305

海派小說論

作 者 / 李 今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主編 / 宋如珊
執行編輯 / 李坤城
圖文排版 / 張慧雯
封面設計 / 莊芯媚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銷售發行 / 林怡君
網路服務 / 林孝騰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ISBN-13 / 978-986-7614-80-3

ISBN-10 / 986-7614-80-1

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

定價：28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總序

1992年，兩岸開放探親後的第五年，我在埋首撰寫論文〈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況〉過程中，驚覺對岸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投入成果，並在種種因緣之下，開始關注對岸文學，一頭栽進大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多年來，心中一直記掛著應該把台灣的大陸文學研究情況也整理出來。因為台灣和大陸是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兩大陣地，除了兩岸學界的本土文學研究之外，還須對照兩岸學界的彼岸文學研究，才能較完整地勾勒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樣貌。去年，我終於把這個想法，部分地呈現在〈台灣的「大陸當代文學研究」觀察〉一文中。但是，這個念頭的萌發到落實，竟已倏忽十年，而在這期間，仍有許多想做和該做的事，尚未完成，不禁令人感慨韶光的飛逝和個人力量的局限。

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的現代華文文學研究，兩岸都因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日益開放多元；近年更因大量研究者的投入，產生豐盛的研究成果，帶起兩岸文學界更加密切的交流。兩岸的研究者，雖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成長，但透過溝通理解、互動砥礪，時時激盪出許多令人讚嘆的火花。

「大陸學者叢書」的構想，便是在這樣的感慨和讚嘆中形成的。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成果的交流和智慧的傳遞，是兩岸文學界最有意義的雙贏；於是我想，應從立足台

灣開始，將對岸學者的文學研究引介來台，這是現階段能夠做也應該做的努力。但是理想與現實之間，常存在著難以克服的主客觀因素，台灣出版界的不景氣，更提高了出版學術著作的困難度。

感謝秀威資訊公司的總經理宋政坤先生，他以顛覆傳統的數位印製模式，導入數位出版作業系統，作為這套叢書背後的堅實後盾，支持我的想法和做法，使「大陸學者叢書」能以學術價值作為出版考量，不受庫存壓力的影響，讓台灣讀者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彼岸的優質學術論著。在兩岸的學術交流上，還有很多的事要做，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相信，這套叢書的出版，會是一個美好開端。

宋如珊

2004年9月 於士林芝山岩

解讀「摩登」：李今和她的海派小說研究

（代序）

在十幾年前的一個熱烈的夏季，我陪侍著導師嚴家炎先生住在北京知春里的一套小公寓中。也就在那時我從嚴先生口中第一次聽到李今的名字，因為那年她報考了嚴先生的博士生，先生和我言談之間對她頗表欣賞。這在一向不但治學嚴謹而且口風甚緊的「嚴加嚴」先生（這是北大中文系師生私下裏對嚴家炎先生的諧稱）是極少見的事情。然而臨到考試的前一天，卻傳來了李今等三位考生公開放棄考試的消息，那並非因為他們自己準備不足，也不是對導師有什麼意見，而是別有不得不然的情由的。李今是其中唯一的女生，而她原本是非常渴望到北大、到嚴先生門下讀書的，為此她已精心準備有年，所以作出放棄的決斷在她自己自然是很痛苦的抉擇，以至她在當晚給嚴先生打電話解釋時泣不成聲。嚴先生當時也頗為惋惜，神情黯然；而我儘管是個對公共事務很不熱心的人，因此曾被嚴先生批評說「太消極」，但當聽到一個那麼嚮往學術的年輕女性為了非個人的原因而作出如此取捨，也不能不為之動容。也就是從那時起我記住了李今這個名字，而且不禁想像一個能如此行事的女子其性情一定很激烈的吧。

然而隨後——大概是 1990 年的夏秋之交吧——我去暫設在萬壽寺的現代文學館校對稿子時，認識了李今，她給我的印象卻全然不是想像中的那麼激烈，倒像個帶髮修行的女居士，寧靜平和，和她的那些苦行僧般的男同事們，在那所破舊的寺廟中不辭艱苦地堅守著一塊被攘攘紅塵遺忘了的學術陣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並且為了維持岌岌可危的現代文學館而四處化緣。而當我問及她放棄考博的「壯舉」時，她不但面無得色，倒是坦誠地說，當時只是覺得就那樣淡若無事地去應考實在於心不安，所以不得不棄考，但內心其實特別為自己惋惜，覺得委屈矛盾得很，以為將是一生的遺憾。我相信這是實話。這樣一種不高自標置的樸實和坦誠，正是李今的本色，而對學術的嚮往，才是她的真正的關懷。也正是為了彌補這份委屈和遺憾，90 年代後期，已身為人母的李今終於還是在相夫教子、擔負刊物編務的辛苦之中，毅然再次投考到嚴先生門下當了一名學生。

這本《海派小說論》就是李今在北大三年攻讀博士學位的學術結晶。說實話，當友朋們得知李今選擇這個課題作學位論文時，是頗有些意外而且不無擔心的。這並非懷疑李今的學術能力。事實上，在這之前，李今已從著名的新文學史料學專家朱金順先生那裏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也譯介過西方的文學理論著作，並出版有專著《個人主義與五四新文學》（北嶽文藝出版社，1992），所以已是大家一致看好的學術新秀。其實大家的擔心倒是出於保護這位學術新秀的好心。如我們的「老師兄」兼李今的頂頭上司吳福輝先生就說他「沒有想到」，因為他覺得李今是個道地的北方人，同

上海毫無淵源，要克服地域文化與個人氣質上的障礙去把握海派小說，那是相當困難、不易見長的。我自己也覺得李今有些「自討苦吃」。因為自 80 年代以來，海派小說已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持續發燒的學術熱點，繼嚴家炎先生關於新感覺派小說的開創性研究之後，李歐梵先生、吳福輝先生並有不凡的建樹，在他們三位的身後更是尾隨著眾多的追隨者，每年在這個課題上的論文都不在少數，仿佛「高燒不退」。但俗話說，能手之後難為功，何況在嚴、李、吳三位高手之後？所以到 90 年代中期，關於海派小說的研究事實上處於熱鬧而膠著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李今如此選擇，在學術上顯然是不大「明智」的。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當大家看了李今厚厚的論文列印稿後，都感覺到多年處於膠著不進狀態的海派小說研究終於有了一次新的突破，而嚴家炎先生、李歐梵先生、吳福輝先生的一致首肯，更屬難得。不難想像，在知難而進的過程中，李今付出了多少辛苦的勞動和艱苦的思索。事實上當時一般人（包括我自己）都覺得這個課題不但剩義無多，就連資料文獻也沒有多少可補充的了。沒想到李今卻一頭扎進上海徐家匯圖書館的舊報刊中，發掘出了一大批不為人知的重要文獻資料，尤其是劉呐鷗、穆時英等人參與「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的資料，從而不僅對因資料的缺乏而一向讓人礙難說清的海派小說家的文藝觀念問題，有了令人豁然開朗的分析，而且進而得以對現代都市時尚文化作打通的觀照，這反過來也使她能夠從借鑒電影藝術這個角度，對海派小說敘事藝術的特點有了過人的發現。同時，李今也特別注意拓展自

己的理論視野和知識結構，恰好 90 年代中期以來文化研究，尤其是都市文化的研究成為國際學術的熱點，李今敏銳地感受到這些與自己的課題的相關性而致力於同步的思考，從而得以避短用長——超越單純以地域文化論海派的限制，而著眼於老上海人和海派作家如何應對世界都市化進程中的一些普遍問題和現代衝擊，因此所見始大、所造遂深，自然與過去只就上海論上海、只就海派論海派的研究大不相同，而令人刮目相看了。

如吳福輝先生就特別讚賞李今獨具慧眼地揭示了海派小說家與西方唯美頹廢派的複雜關聯，以及對海派代表作家作品的精細入微的解讀功夫。作為與李今同代的學術同行，我對此也深有同感。應該說，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大陸學術界對文學現代主義的知識視野大都局限於 20 世紀以來的歐美現代主義諸流派，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海派小說的現代性，雖然不能說錯，但不免有些籠統，而疏忽了海派小說與世紀末唯美頹廢主義的淵源關係，因此李今對這種關係的系統深入的揭示，使我們對海派小說的現代性有了更為具體、更為準確的認識，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推進。而就我個人的觀察所及，20 世紀以來中國學者、批評家對小說的研究與批評，在具體的小說文本分析方面實在粗枝大葉，太滿足於籠統的大判斷或印象式的評點，而鮮見精細入微、令人心折的文本解讀。在海峽那邊，唯一的例外是歐陽子女士 70 年代末為白先勇先生的小說《臺北人》所撰寫的批評著作《王謝堂前的燕子》，那是一部創造性地運用英美「新批評」方法的批評傑作，在漢語小說批評史上可說是沒有先

例的著作。在大陸這邊，小說研究先是長期停滯在傳統的考證和教條的社會學分析中，進入改革開放之後，則又一直沉溺於對西方學術新潮如饑似渴而又大而化之的追逐，而很少有人關心具體的文本分析問題，雖然「新批評」又一次輸入了，但人們只是競相搬弄它的一些詩學概念來把自己論著打扮得時新一些而已。所以當我在 80 年代中期開始讀文學研究生的時候，一個令我苦惱到幾乎放棄學業的難題是，儘管自己可以說出這樣或那樣頗有理論根據而其實人云亦云的大道理，但面對一篇小說，雖然對它不無感受，可要做具體的分析和闡釋，卻痛感除了套話外幾乎不知從何說起、如何解讀。正是這點自感無聊而又不甘於無聊的自覺，促使我開始暗自摸索文本分析的方法。雖然我自己在這方面迄無所成，但因為有過這樣的苦惱和摸索，所以看到李今把開闊的都市文化研究視野成功地落實到精細的文本分析之中，我是感佩有加的。本書中「海派與電影」、「日常生活意識和都市市民的哲學」等章之所以讓人讀了深信不疑，其實不僅在於它們理論視野的獨特和學術觀點的新穎，更重要的是李今細緻入微的文本解讀給了我們妥帖愜當、怡然理順之感——沒有這個，就只是觀點的徒然新穎而已，未必能夠讓人信服。事實上，近十多年來大陸學術界關於現代文學的文化研究已成風氣，但所論卻往往給人大而無當、膚廓不實之感，就因為論者只滿足於文化視野的「大處著眼」，卻忽視了從具體的文本分析這個「小處入手」。在這種學術風氣下，李今的這本探討「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的論著，著力「按照『言必有據』的學術要求，從文本分析、史實證明和理論

依據幾個方面加強闡述論題的實證性」（原書「小引」），所以它在諸多論著中穎然秀出，是並非偶然的。

從學術發展的脈絡來看，我以為李今這本著作最值得重視的學術貢獻，是她對海派小說以至於海派文化的兩面性或矛盾性的深入抉發，這無疑標誌著海派研究在歷經「平反發覆」、「正名加封」和新的「一邊倒」好評之後，已步入可以平心而論、辯正分析的新階段。

在此不妨扼要回顧一下近 20 年來關於海派小說的研究進程。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海派小說在 1949 年以後的海峽兩岸長期被埋沒了。直到上世紀 80 年代初，大陸轉入改革開放，文學觀念隨之解放，學術研究亦漸趨解禁，嚴家炎先生始從舊紙堆中發掘出了海派小說的主幹新感覺派諸作家的作品，編為《新感覺派小說選》一書，並在該書的長篇前言中和稍後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指出「這是中國第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既肯定了該派的現代主義實驗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同時也對該派小說的一些甚違情理之處有所批評。海派小說研究就是從這個平反發覆起步的。以嚴先生的發掘為基礎，李歐梵先生緊接著又將新感覺派小說介紹到港臺和海外，並譽之為「中國現代（主義）小說的先驅」，推為臺灣 60 年代現代主義小說的不祧之祖，從加封的頭銜可以看出，對海派小說的評價已經進一步提高了。進入 90 年代，那個壓抑個人利益和個人欲望的時代終於灰頭灰臉地徹底結束了，各種政治和人生的理想主義讓位於現代的生活享受、消費方式、娛樂形式——它們又一次隨著先進

的洋貨一同進口，吊起了人們的胃口、刺激著人們的欲望，越來越多的人們驚訝地發現自己原來是個「食色」動物，而況現代都市裏的時髦物事是那麼光鮮誘人，現代的享受是那麼難以抗拒。於是人們在競相「下海」或觀海的同時，重新發現了十里洋場的「上海」作為東方最現代的都市的繁華與摩登，以及產生在這個現代都市的海派文學的生猛勁和開放性，歎賞這一切在當今「全球化」的熱潮中具有的先行之典範意義。值此之時，吳福輝先生以他曾是上海的土生子而今身為資深京派學者的雙重資歷，出頭為一度聲名狼藉的「海派文學」正名。他傾注多年的積累和體會發為《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一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不僅準確地揭示出了海派小說的來龍去脈，理直氣壯地肯定了它的「現代質」，而且也率先考察了海派小說作為現代都市產兒的「正面」和「負面」。吳福輝先生的研究顯然啟發了稍後的研究者。

90年代後期有兩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孕育和產生了。一部是李歐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李先生乃學術名家，博學多聞，富有大都會的生活經驗和國際性的學術視野，所以由他來重釋「上海現代性」，自然再合適不過了，並且他也從其同事馬太·卡林奈斯庫那裏領悟到「文學和藝術上的現代性，其實是和歷史上的現代性分道而馳的，前者甚至可以看做是對後者的市儈和庸俗的一種反抗」，所以人們完全可以指望李先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深入分析。李先生的書也的確搜羅宏富而又妙筆生花，所以精彩紛呈，令人目不暇接。看得出來，李先生對西方領潮的都

市文化是情有獨鍾的，這自然使他對「上海摩登」的態度近於「一邊倒」的偏愛，加上浪漫的學術氣質，所以他「更願意把這種景象——上海租界裏的中國作家熱烈擁抱西方文化——視為是一種中國世界主義的表現」而歎賞有加。雖然在李先生參差對照的張愛玲式筆法下，左翼文學及其對海派文學的批評也時不時地出現，可都仿佛又醜又惡的「陪襯人」，所以連同「戰火」、「革命」等一起被視為「招滅」海派摩登文藝天才的厭物。至此，摩登的上海都市文化——包括海派小說，由於符合世界主義的潮流而得到了高度的肯定，也因此不難理解的是，當「摩登」上海因為革命而沒落之後，李先生在「中國」可寄託其對世界性大都市摩登文化之愛好的，便只有英國人治理下的香港了。不待說，這樣一種純然向西看齊的世界主義觀點，自然對「上海摩登」的價值有其獨到的發現，但也不免讓人感到有些單純和片面了。

同時產生的另一部著作就是李今的這本書。李今對海派文學當然不乏有同情的理解，但她的思考沒有被自己的同情和對象的摩登所左右，所以能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縱深開掘，對摩登的海派文學和海派文化之兩面性、矛盾性，頗多切中肯綮、洞見利弊的分析，令人有豁然開朗之感。在她看來，以資本家、商人、中上層職員等為主體的新市民，不僅經濟狀況較為富裕、受過現代的西式教育，而且形成了以追逐西方生活方式為現代、為摩登的消費模式和生活趣味，這既為海派小說提供了素材和創作的動力，但同時也制約和同化著海派小說的境界與取向。她肯定，海派小說家將人性從神聖化、理想化、超越性還原到人的生物性、求生的本能和

世俗的生存理性，確是更近事實真相和人性真實的，所以他們的小說對世俗凡人的欲望和本能的表現雖不免過於形而下，卻也勃勃有生人之氣，增進了人們對人性的理解。但同時李今也不諱言，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那些同樣強調生活的物質性和肉體因素的代表作品相比，海派小說中所著力表現的那些執著物質與肉體欲望的人物形象，顯然缺乏「豐腴、生長和興旺」的積極性質，更未能像西方現代主義傑作那樣將人的本能欲望發展昇華到一種「非理性的激情」境界。她認為，海派小說所表現的現代市民的價值觀和自我意識，「雖自私但獨立、雖世俗又有理性、雖然物化還不失主動選擇的主體意識的精神特徵，既證實著都市新市民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又暴露其局限和異化的傾向。」並指出，海派作家「對於都市文明既追隨，又有反省和批判；既喜歡，又厭惡。而這種複雜的意識情感正是現代主義作家的基本認識模式和情感模式，它促進了一種對生活的廣闊而複雜的理解。」因此，李今肯認海派作家群中的新感覺派諸家和張愛玲的創作，屬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比較先鋒和前衛的現代主義佳作之列，但同時她也發現既是這類作品也難免都市流行文學的從俗以至於媚俗的格調。所以李今又強調說，海派小說「雖然也表現了自我在都市『荒原』中的孤獨寂寞感，受壓抑的人的本能衝動和內心活動，但更社會化、世俗化，也多少流於『輕』和『浮』，只有後來的張愛玲能夠把對人的生存狀態的考察引向深入，但也正是由於她雖然並不認可，但又太多地認定常人的生存狀態的普遍性，使她對於有關人的形而上問題的探討，反而得出了形而下的結論，雖深刻但缺少使

人昇華的精神力量和批判力量。這也正是海派小說貌似現代主義，但在本質上與西方這一精英文化所關心的自我問題和精神層面的相異之處。」……這樣一種深入分析、辯正觀照的思想態度貫穿全書，雖然我們不一定贊成作者的每一處分析、每一個判斷，但就其大體而言，的確發人深省，顯著地推進了海派小說研究的學術進程，深化了我們對上海「摩登」的認識。

我和李今誼屬同門，在學術上相互切磋，求同存異，從不客氣。關於海派小說，我們的看法也不盡一致，在此也略說幾句。李今在本書中曾提到與海派小說有關的「輕文學」這個概念，並解釋說「輕文學」（Light Literature）的「輕（Light）」意指不深刻、不嚴肅、不沉重，帶有消遣性和娛樂性，所以「輕文學」一般都不大關懷、甚至拒絕涉及國家社會的大問題。在李今看來，「如果根據輕文學的分類，把新感覺派完全歸入消遣性的大眾文學範疇，似乎也並不完全合適，因為他們又有著鮮明的純文學追求。」我得老實招認，這是對我的商榷，因為說新感覺派小說是「輕文學」、把它「完全歸入消遣性的大眾文學範疇」，就是我的看法。這說來倒是受了已故的施蛰存先生的啟發。記得 80 年代末我看到施先生在《說說我自己》一文中如此坦承：「1930 年代，西歐文學，正在通行心理分析，內心獨白，和三個『克』：Erotic, Exotic, Grotesque（色情的，異國情調的，怪奇的），我也大受影響，寫出了各式仿製品。經過第二次大戰，這一陣文學風尚，已被孤兒寡婦的眼淚和猶太人的血沖洗掉。它過時了，可想而知，我那些小說，卻和秦始皇的兵馬俑同時

出土，芻靈成為寶物。自從嚴家炎編出了一本《新感覺派小說選》，封我為『新感覺派主要作家』，美國的李歐梵教授在臺灣刊物上推波助瀾，封我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這樣一吹一捧，使我那些『假洋鬼子』作品，被不少文學青年或青年作家奉為現代的文學典範。願上帝保佑，讓我的那些『新感覺』小說安息吧。」這讓我深為感動，因為我相信這是施先生的心裏話，並非出於什麼政治壓力，而施先生對自己當年的藝術趣味和創作奧秘的這番自我解剖，恰好與我當時對他以及他的文學同伴們的閱讀印象相符，再加上我當時對現代主義的理解又比較嚴格——我以為文學上的現代主義，不僅具有藝術上的先鋒性、實驗性，而且是對現代文明及資產階級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質疑、反叛，其中包含著對都市生態中孤獨的個人存在狀況和生命意義的嚴肅探詢，因而與流行的媚俗的都市大眾文學是判然有別的。從這樣一種觀點來看，被認為是中國現代主義的新感覺派小說就似是而非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與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是不同的，這不同意見也曾對導師嚴家炎先生說起過。也正是鑑於新感覺派小說雖然從西方現代思想和現代文藝那裏汲取了不少時新的因素而貌似「現代」，但究其實更像時髦化、媚俗化、趣味化的現代都市流行文學，並且隱含著一種避重就輕的人生態度，而施蛰存先生當年又曾明言要「弄一點有趣味的輕文學」，所以我便把施先生及其他一些作家的創作稱為「趣味主義的輕文學」。如今重讀李今的這本著作，使我意識到自己不免偏狹，顯然忽視了新感覺派的藝術貢獻——用「輕文學」來指稱新感覺派小說，確實有些埋沒其「現

代性」和「前衛性」。但李今的商榷並沒有完全改變我對新感覺派小說的觀感，因為該派作家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追逐時髦、渲染刺激、迎合流俗的趣味，連其中翹楚施蛰存先生也未能例外，這只要看看他的《魔道》、《凶宅》諸篇以及他自己稍後的自我批評，就不容諱言，更無論劉呐鷗筆下的色情風景和穆時英筆下的白金女體之類了。要說這些就是「現代」和「前衛」，那不是太容易、太輕鬆了麼？然則，究竟應該怎麼品評這些乍看很似現代、再看讓人起疑的海派作品之境界，及其作者的文學行為方式呢？受李今質疑的推動和李歐梵先生著作的啟發，我忽然想到「摩登主義」倒不失為一個較為恰當的「說法」。「摩登」也者，「Modern」是也，然而「摩登」未必是本真的原創的「Modern」，也不一定是反「Modern」的「Modernity」，倒往往是把來自西方的「Modern」和「Modernity」當作時尚而加以複製，使之流行，以迎合大都市中產階級追逐時髦和新鮮刺激的文化—消費口味。這樣一種複製「現代」所以貌似「現代」、但不免使「現代」時尚化以至於庸俗化的文化消費和文學行為方式，就是「摩登主義」。記得十五、六年前曾經讀過歐文·豪（Irving Howe）論現代主義文化的一篇文章，裏面仿佛說過：現代主義一旦流行走俏，就趨於它的反面，而不再是現代主義了（原書不在手頭，此處僅憑記憶略述大意，容或有誤）。的確，真正的現代主義文化是不從眾、非時尚和反庸俗的，但它也難逃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當它一旦在孤傲中苦熬成功之後，隨即就會因其成功而被複製、模仿，成為流行時尚，因而也必然會被庸俗化。竊以為，如果上述